

文史知识

我怎样学习写作的

清朝的绿营

诗的毁灭——《红楼梦》里第一个「薄命女」

说孟浩然《过故人庄》

《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

文言文教学札记

从《先君墓表》到《泃冈阡表》

什么是「反切」？

朱东润

罗尔纲

蒋和森

倪其心

刘叶秋

颜振遥

王水照

邢公畹

2

1981

WEN SHI
ZHI SHI

文史知识

1981年2月
第 二 期

治学之道

- 我怎样学习写作的.....朱东润 3

文学史百题

-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费振刚 9

历史百题

- 清朝的绿营.....罗尔纲 14

怎样读

- 诗的毁灭——谈《红楼梦》中的第一个“薄命女”...蒋和森 18

诗文欣赏

- 说孟浩然《过故人庄》.....倪其心 23

- 韩愈《师说》讲析.....周振甫 27

- 读李商隐的一首《无题》.....郝世峰 32

- 读《游褒禅山记》.....胡念貽 36

- 中国历史知识及其年代学的处理.....周谷城 39

- 杨家将的历史和传说.....羽 白 43

文史杂谈

- 学历史，向前看.....柯 安 49

- 学慎始习.....敏 泽 53

- “词可达意”(漫画).....李滨声 52

文史书目答问

- 《左传》.....沈玉成 57

- 《樊川文集》(附《樊川文集》).....戴 燕 60

文史工具书介绍

- 《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刘叶秋 62

- 我国古代国家首脑的称号.....左言东 69

人物春秋

- 呕心沥血的青年诗人李贺.....宋德金 74

武训办“义学”	史元	78
梅兰芳的艺术道路	马少波	81
成语典故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谷雨	87
语言知识		
语言运用中的变异现象(上)	潘兆明	88
趣味词义辨析(选载)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	93
教学随笔		
文言文教学札记	特级教师 颜振遥	96
司马迁和他的不朽巨著《史记》	安平秋	100
司马光怎样编修《资治通鉴》	徐志啸	105
佛经寓言故事选译	白化文 许德楠	108
文章评改		
从《先君墓表》到《泃冈阡表》	王水照	112
——欧阳修修改文章一例		
名胜古迹		
玉城雪岭际天来——漫话浙江潮	慕容真	116
天一明珠——访宁波天一阁	来新夏	120
中国名著在国外		
回忆匈牙利陈国教授译《水浒全传》	兴万生	122
文史信箱		
什么是“反切”?	邢公畹	125
补白 7 则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8)	生吞活剥 (68)	
“五车”和“八斗” (73)	改“读书”作“视书” (80)	
教学相长 (86)	陶侃运甓 (92)	为者常成 (95)

封面设计：范贻光

本期插画：熊真

文史知识

1981年2月
第 二 期

治学之道

- 我怎样学习写作的.....朱东润 3

文学史百题

-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费振刚 9

历史百题

- 清朝的绿营.....罗尔纲 14

怎样读

- 诗的毁灭——谈《红楼梦》中的第一个“薄命女”...蒋和森 18

诗文欣赏

- 说孟浩然《过故人庄》.....倪其心 23

- 韩愈《师说》讲析.....周振甫 27

- 读李商隐的一首《无题》.....郝世峰 32

- 读《游褒禅山记》.....胡念貽 36

- 中国历史知识及其年代学的处理.....周谷城 39

- 杨家将的历史和传说.....羽 白 43

文史杂谈

- 学历史，向前看.....柯 安 49

- 学慎始习.....敏 泽 53

- “词可达意”(漫画).....李滨声 52

文史书目答问

- 《左传》.....沈玉成 57

- 《樊川文集》(附《樊川诗注》).....戴 燕 60

文史工具书介绍

- 《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刘叶秋 62

- 我国古代国家首脑的称号.....左言东 69

人物春秋

- 呕心沥血的青年诗人李贺.....宋德金 74

武训办“义学”	史元	78
梅兰芳的艺术道路	马少波	81
成语典故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谷雨	87
语言知识		
语言运用中的变异现象(上)	潘兆明	88
趣味词义辨析(选载)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	93
教学随笔		
文言文教学札记	特级教师 颜振遥	96
司马迁和他的不朽巨著《史记》	安平秋	100
司马光怎样编修《资治通鉴》	徐志啸	105
佛经寓言故事选译	白化文 许德楠	108
文章评改		
从《先君墓表》到《泃冈阡表》	王水照	112
——欧阳修修改文章一例		
名胜古迹		
玉城雪岭际天来——漫话浙江潮	慕容真	116
天一明珠——访宁波天一阁	来新夏	120
中国名著在国外		
回忆匈牙利陈国教授译《水浒全传》	兴万生	122
文史信箱		
什么是“反切”?	邢公畹	125
补白 7 则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8)	生吞活剥 (68)	
“五车”和“八斗” (73)	改“读书”作“视书” (80)	
教学相长 (86)	陶侃运甓 (92)	为者常成 (95)

封面设计：范贻光

本期插画：熊真

我怎样学习写作的

朱东润



朱东润先生，江苏泰兴人，生于1896年，是我国著名传记文学家。现任复旦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等。

我学习写作，应当说是从一九〇四年开始的。那时我在私塾已经读过三年，正进入初级小学。私塾的生活大家都知道，总不外是拜老师、打手心，——其余就是早晨入学，向孔圣人拜一拜，傍晚散学还得拜一拜。在私塾里也偶然做些对子，不过那样的机会是不多的。

一九〇四年我实在不愿意读私塾了，这年地方上办起了初等小学，那时称为蒙学堂。到了这里我们开始作文了。科举还未废，小学也在初办，作文应当是怎样的办法，连老师也不清楚。这就出现了“四书义”的要求，就是说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里出一句，要大家议一议。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八股，不过不一定要求起讲、对比之类的习套。聪明一点的学生就搬出《四书备旨》来抄一段。不客气，我也照抄一段，只要大体上说得过去，老师总是高抬贵手，我们就算逃过了这一关。

一年以后，我们升学了，是高等小学的预备班。这一年科举算是废定了，我们也用不到再抄《四书备旨》了，老师要我们读一些《史论启蒙》、《东莱博议》之类。一篇《管仲论》，我们把管仲骂得来，骂过

去，其实与管仲毫不相关，只觉得苏明元的最后一句：“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有些把管仲问得无言可答。好在管仲死了二千年，他用不到对苏明元再作陈述。

十一岁那一年，我到上海，插入南洋公学的附属高小二年级，这才开了眼界。上海究竟是大地方，附属小学在当时高明多了，我们的思路广阔了。老师还带我们到曹家渡、佘山、苏州天平山等地旅行，眼界开阔了。我到上海的那一天，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正凭着“二辰丸”的事件向中国进行讹诈。到处是卖书的地摊，堆满了《革命军》、《西太后》、《扬州十日记》这一类的书籍。书的种类是各式各样的，总的倾向是指出满洲人入关以后一般人民所受的痛苦，同时也说明了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侵略。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结果。

由于校长唐文治先生的提倡，南洋公学的学生在写作方面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南洋公学是最初的名称，以后一度称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唐先生最初称为监督，以后称为校长，直到该校改称交通大学的时候，唐先生还是校长。唐先生每天穿着制服，毕恭毕敬地坐在校长室的一角，接待各方面来访的人物和本校的任何一位师生员工。那种谦虚诚恳的态度，至今犹在我脑中历历如绘。

唐先生是科举出身，出过国，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但是他在写作方面却是要我们写八大家古文，因此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成为我们向往的人物。当然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期，这些人物的形象在我头脑中已经淡薄了，虽然不能说没有一些影响，但是我敢说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做一位古文家的意思。可是韩愈那两句“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的思想，对我是起着莫大的影响的。这就是说青年时期的师长对于学生常常起到不可磨灭的印象。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可能体会到这一层意义。

说一句题外的话吧。我是二十多岁走上教育岗位的时候，感到自己的书法实在不行，作为人民教师，怎样交代得过呢？我发心要对书法下一些苦工夫。从哪里学起呢？中国的书法是从篆书起的，以后有隶书、草书、楷书；这是一个发展的顺序。但是草书是应当在真书的

基础上建立的，不能作楷书，草书是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的。我是一个笨人，自己也是这样地认定的。我立志在写好十五年篆书的基础上，然后再写隶书，对于真书草书，我也作同样的打算。那时我才二十多岁，看来经过六十年的锻炼，总会有一些成就。会不会活到八十岁呢？我完全没有把握，不过不搞书法的人，同样地也不一定有把握活到八十多岁，所以搞书法和不搞书法，其结果是一样的。我想有目的活着总比没有目的活着好。目今我已活到八十以外了，书法虽然没有长进，但是我想这六十年中的业余时间究竟给我一个目的，决定不是浪费的。

二十岁的前后，我曾有机会和外国文学发生过接触，以后又在中等学校教过十二年的外语。外语当然不是中国文学，但是和中国文学是有一定的相互关系的。不理解外语，就不可能直接和外国文学接触。无论在文学方面，我们付出怎样大的努力，但是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有极大区别的。不过这只是解放以来我们的一个共同认识，在解放以前，有这样的认识的人是不多的。有些大学中文系甚至认为了解了外国语，便必然影响到中国语文的学习。不仅如此，有些教授甚至认定白话不是文学，外国语当然更不是文学了。所以了解外国语的先生，从这些教授看来，正证明了他不配了解中国文学。一九三〇年的前后，这样的中文系教授，我可以开列一个不太短的名单，当然现在不用再提了。

一九二九年我在华中的一所大学教外语，那时闻一多教授正在担任文学院长。他苦于中文系的不易向前，想起在中文系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课，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是没有改造中文系的潜意识，但是在当时这门课还是一件新鲜事，书肆里除了陈中凡教授有一本这样的书以外，没有第二本。陈先生虽然筚路蓝缕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还有一些采用了第二手材料，说服力不够强大，因此我和一多说：“是不是可以给我一年的准备时间？”一多欣然地说：“完全可以。”这一来我就把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准备这个新课。我在那所大学里，多年开了这个课，课余之暇，也为那校的《文哲季刊》写了十多篇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是讨论《诗》三百篇的四篇文章，后来称为《读诗四论》，加了一篇序论，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因为出版时候，正值香港陷落的前后，

该书是在香港出版，因此在国内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解放以后，我在无锡的一所大学教书，由于该校一度陷于停顿的边缘，苏南文教处要我们出面共同维持，以后由于多方争执，造成一种不可避免的僵局。我有了时间，这才获得一个写出《楚辞探故》的机会。那时叶圣陶先生在北京问我有什么著作，我说有的，但是不想发表。叶先生说：“何不寄来看看呢？”我把这四篇文章寄出，不料叶先生竟交给《光明日报》发表了。《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支柱，但是对于《楚辞》的作者，汉代本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王逸，他认定是屈原的，这是大众接受的意见。一是荀悦，他认定是刘安做的，是极少数人的意见。我没有断定是谁做的，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但是我认为荀悦的说法不会无因而至，因此提出一些可以申述的理由。不料遭到郭沫若院长的痛斥，他教育了还不够，更引出其他两位帮腔，根本连荀悦的《后汉纪》也否定了。那时我在齐鲁大学教书，那是一座教会学校的底子，虽然解放以后经过接管，中国书还是不多的，我又没有呼朋引类的本领，因此只有由郭院长在那里教育。好在这样的例子还不少，郭院长的教育和他身后受到的反教育都不是罕见的。我申述了荀悦的两个看法，是非曲直，由荀悦自己去负责吧。在刑事诉讼的当中，即使刑事犯负了弥天大罪，很少把辩护律师一同处分的。

在四十年代我已经发现了另外一条道路。明代中叶以后没有出现过一个为国家负责的皇帝，衰亡的迹象已经到处都是，幸亏出来一个张居正。他的地位是内阁大学士。大学士是明代特有的一种职位，名义上，他只是皇帝的秘书，没有任何的职权，事实上，特别是首辅大学士，他要担负全国的一切：政治、军事、外交、民政、财政、交通、税收、工程，什么都得要他管。管得好，他只是尽忠于他的职守，旁人还可以说他大权独揽。管得不好，不满意他的人说他一声不好，他就得把自己的头颅或是子孙的头颅赎回这个捕风捉影的罪过。然而张居正毕竟担当起这个职务。为什么？为的是不忍看到明王朝的衰亡。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想来中年以上的读者都还记忆犹新。我所以写《张居正大传》，决不是无因而至的。在这本书出版以后的一年，吴晗教授的《朱元璋传》也出版了。我想一般的读者是会体谅作者

的苦心的。

在《张居正大传》写成以后，我写了《王守仁大传》。我对于王守仁的哲学理想是认识不够的，但是他那种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精神是中国罕有的，也唯有这种精神才能从危亡的当中，把中国解救出来。在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上海的正中书局曾有人来联系过。我因为当时正中书局的后台有问题，因此没有同意出版，原稿藏在泰兴家中。十年浩劫，我自己也不知命在何时，《王守仁大传》原稿的下落，当然更无从过问了。

解放以后，一九五八年来一个大跃进。大学里面更是跃进的源泉。那时我是系主任，是全系的目标，无论我的内外工作如何繁重，总得带个头。十万字、二十万字都不行，跳脚的跳脚，拍桌子的拍桌子，最后总算在各项工作以外，承认写三部书——《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诗选》，共五十万字而结束。那时的风气是说的時候不得不承认；说过之后一字不着，尽得风流也不妨。可是我这一个笨伯，还得起早带夜地干，终于在一九五九年秋季开学之前把这三部书写成了。事实上陆游这三部书并不难写，因为陆游的生活，主要见于《放翁诗稿》，而《放翁诗稿》又是编年的，这就把陆游的事迹，给我们一个主要的轮廓。有了《放翁诗稿》，我们就不啻得到一个很好的启示。

对于宋代诗人，陆游最推重的是梅尧臣，后来的刘克庄也有同样的认识。无论后人对于梅尧臣有什么不同的估计，但是我对于陆游和刘克庄的评论是不敢轻置的。清末的夏敬观对于尧臣更是推重备至。他说只要根据元人张师曾的年谱，对于尧臣的诗及其生活的发展，可以得到一个大概。夏先生对于尧臣诗的认识确实是有不少的创见，为后学所不可望及；但是他对于张谱的推重，只要了解宋代的官制，便有许多不可索解之处。尧臣和范仲淹的中途绝交，以及他对于文彦博的愤愤不平，在张谱中也都没有提及。至若尧臣诸诗，敬观所指某篇作于某年，按之事实，亦不尽合。夏先生为近代最能理解尧臣之论师，而夏先生所未及，似亦不能不容后人加以补充。因此我写成《梅尧臣传》、《梅尧臣诗选》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三书。最后一书，凡屡易稿而后成。这三部书在浩劫中也被没收，部分急进的青年主张立即烧

毁，但是更多的青年主张千万不可烧毁。靠着这几位同学的力争，又经过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古籍出版社的协助，三部书先后出版了，其中必然有若干的错误或混乱，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本来的目标只是提供一个粗浅的初稿以便后人加以提高和改进。任何责难都是应该的，也是我所不辞的。

是不是我还得写一些其它的作品呢？我不敢肯定，因为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只要对于时代和人民有一些微薄的贡献，我是不会、也不应当推辞的。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在《文史知识》的封面上，四角装饰着四个图案，画着飞禽走兽，这就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四方之神，即青龙（一作苍龙）、白虎、朱雀（一作朱鸟）、玄武，分别象征着东、西、南、北四个方面。它的形象，青龙是一条腾龙，白虎是一支跃虎，朱雀是一支飞鸟，玄武是一条蛇缠着乌龟。过去，军队列阵，“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见《礼记·曲礼上》），就是用这四种形象做成的旗帜分别标志南、北、东、西四个方向的。

后来，这一组形象常用作浮饰、图案，更常制作于瓦当（dàng）之上。瓦当，是筒瓦之头，多呈圆形；置于屋顶房椽之端，借以增加建筑的工艺美。

《文史知识》封面上的图案，就是从汉代瓦当上拓下来的，借以突出杂志的亦文亦史的特色。

（顾 而）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

费振刚

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最流行的文体，当时一般的文士都从事这种文体的写作，有不少的人还为此耗尽了毕生的才力。尽管它的思想和艺术的成就很难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媲美，但后代仍有不少文学评论家把它看成是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汉赋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在文体前标明时代，只是说明这一文体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高峰，并不意味着这一文体在这个时代才突兀出现。它们在被文人引入文坛之前，都曾作为一种通俗文学的形式，长期在民间流传。赋作为一种文体最早是在战国后期的楚国开始兴起来的，它的主要特点是“不歌而诵”，适宜于口诵朗读。它的抒情成分少，着重铺叙和描写，接近于散文；行文时又往往韵散间出，具有半诗半

文的性质；在篇章结构上则多采用问答的形式。从我国文学史看，诗歌的产生先于散文，它在最初的阶段与音乐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左传》等先秦文献中有着不少“歌诗”的记载，但同时就有着“赋诗”，即用口头朗诵诗的记载。赋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它不同于《诗经》中的作品，是不合乐歌唱的，当时人们根据这一特点，把它称之为“赋”，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汉代经师在解释《诗经》时，又把它表现手法归结为“赋、比、兴”，而作为表现手法的赋，正是铺张敷陈的意思。作为文体的赋在手法上也确有铺张的特色，于是有人把二者混同起来，认为赋体作品是由《诗经》赋的表现手法而发展起来的，其实并不确切。

根据现存材料，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子。《荀子》书中的《成

相》篇，就是作者采用当时流行在民间的劳动号子一类讴谣体而写成的。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荀子》书中的《赋篇》也并非是荀子的凭空创造，其体裁也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文学形式，由他吸收来进行尝试写作的。从《赋篇》的内容看，除《俛诗》外，写的是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表现手法完全是采用“隐语”，即后世民间流行的猜谜语的方式，这也正是它的民俗性的证明。

在战国大力写赋的还有宋玉。宋玉也是楚国人，传为屈原的弟子。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这里，司马迁是把辞、赋区别来说的，辞即楚辞，属于诗的范围，而赋虽出于楚辞，但它韵散间出，更接近于散文。《汉书·艺文志》把辞和赋通称为赋，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宋玉的《九辩》是楚辞体，而其余传为是他的作品者都是赋，它们都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其开头部分用散文写明作赋的缘由，而主体部分则用铺张的手法来描摹所赋事物的情况，绝少楚辞的那样浓重的抒情成分，这正是赋体

的特征。

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有的虽以赋名篇，但大多是楚辞的余绪，显示由辞转为赋的过渡痕迹。而初步奠定汉赋体制的是枚乘的《七发》。《七发》说的是楚太子有病，吴客去问病。吴客首先指出奢侈享乐是太子病的根源，并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疗，接下去他分别以音乐、饮食、车马、游览、田猎、观涛的乐趣来启发太子，由近及远，由静而动，逐步吸引太子的注意力，以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观涛一段，作者从多种角度来描摹涛的形状及其变化，绘声象形，丰满生动，确把这“天下怪异诡观”的景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使人产生涤荡胸襟，发蒙解惑的效果。正是在吴客这样的诱导下，太子的病虽然没有完全好，但已“有起色”，喜悦的表情开始在眉宇之间出现，而渐及整个面部。在此基础上，吴客进一步要介绍那些著名的“方术之士”来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于是太子据案而起，仿佛听到了他们的“要言妙道”，出了一身大汗，病就完全好了。很显然，作者认为象楚太子这样的贵族子弟所患的

病要治好，除了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外，更主要的是要用作者认定的圣人辩士的“要言妙道”来改变他们的志趣。这表明了作者对封建贵族奢侈腐化生活的不满，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揭露作用。《七发》在形式上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中间虽然杂有少数楚辞式的语句，但就通篇来说是间有韵文的散文，在状物叙事上则带有铺陈夸张的特点。这都为后来司马相如等汉赋作家所继承、发展而形成固定的所谓“七体”的格局，因此《七发》在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我们从文学本身叙述了作为新兴的文体赋的形成、发展和它的特点，但汉赋最繁盛的时期，以及最能代表汉赋特色的汉代大赋还没有出现。它们的出现还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来配合。

广大劳动人民以血汗和生命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外贸易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兴旺，也为君王贵族乃至地主豪商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他们夸富斗奇，大兴土木，起造宫室苑囿，游乐狩猎于其中，而汉赋的典型作品，即所谓的游猎、京都大赋就正是以统治阶级

这样的畸形的物质生活为其直接的描写对象的。汉初萧何为汉高祖刘邦建造长乐宫、未央宫，刘邦感到豪华过分，萧何却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而汉代赋家写赋，正是用铺张扬厉的文字来颂扬贵族君主的生活环境和他们的享乐，又以其富庶繁盛来衬托汉家天子的威严，这正好适应了统治阶级说要尽情的享受，又要找出堂皇理由的虚伪心理。即使是赋的末尾那一点“归之于节俭”的讽谏内容，也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在他们极尽奢侈为能事之后，求得心理上的平静。而“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汉书·扬雄传》的实例，正好说明这种讽谏的实际效用。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汉武帝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早已闻名的著名赋家枚乘迎来长安。遗憾的是，尽管他用了最平隐的车子（所谓“安车蒲轮”），但年老的枚乘仍经不起路途的颠簸而死于途中。我们也会明白为什么当他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会发出“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的感叹。而当狗监杨得

意说这是他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汉武帝真是又惊又喜，很快召见了司马相如，并且成为了他不离左右的侍从之臣。汉武帝如此，他以后的宣帝、成帝也是如此，他们都以利禄为引诱，把许多著名的赋家招致到他们的周围，这正是造成汉赋在汉武帝以后一段时间里特别繁荣的重要原因。

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

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云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

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班固对汉赋的完全肯定和赞扬，是由于他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但他为我们简要地描述了汉赋繁盛时期的情况，同时也使我们认清了汉赋的社会作用和本质，它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

中国文学发展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一种文学样式在民间兴起，渐渐被文人所重视、所运用，由一种被鄙视的俗体而成为文坛的正统形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它在体制上更加完备，在表现方法上更加精细，但它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发展。汉赋也不例外。赋发展到汉代，它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在汉武帝等皇帝的大力提倡下而盛极一时，特别是由于众多的作者的共同努力，使它的艺术的表现日趋完善，司马相如正是这众多作者中的最突出的人物。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是一个一生致力写赋的文学家。《子虚上林赋》是他的代表作品。这篇赋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它是借楚使子虚和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对话联结成篇的。作品先由子虚

和乌有先生互相夸耀楚齐游猎的盛况，最后由亡是公以天子上林苑的壮丽、游猎规模的盛大以压倒齐楚，表示了汉天子君临天下的声威。联系到被平息不久的吴楚七国侯王的叛乱，作者这样的描写，在政治上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是它受到汉武帝的激赏的重要原因。这篇赋结构宏伟，词汇丰富，多用骈语、排句，层层渲染，气势充沛，时有生动形象的描写，如描写音乐的一段：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寓（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虞；建翠华之旗，树灵鼙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但总的说来，这种描写夸张失实，而减弱了艺术感染人的力量，特别是由于它的写法十分呆板而缺少变化，如描写一个地方，总是其山怎样，其石怎样，其东、其南、其北、其西有什么，其上、其下有什么，又加上作者精通文字学，喜欢用奇词僻字，因此单看某一个片段，似乎词采绚丽，但从整体来看，却象一件百衲衣，

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失去了和谐的自然之美。汉赋在司马相如手中建立了固定的形体，《子虚上林赋》成为后世赋家写作的典范。自此以后，刻意模仿，形成风气，以至象西汉末年的扬雄、东汉初年的班固等人，他们在思想、才力诸方面都堪称大家，但他们的赋，都没有越过《子虚上林赋》的藩篱，全然失去了自己的创造力。正是由于这一点，扬雄晚年觉悟到早年热心写赋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的小技，而终止了赋的写作。扬雄晚年这一看法与班固对赋的完全肯定一样，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汉赋的性质。联系到汉武帝时另一赋家枚皋“自悔类倡”的感叹，更可以使明白在封建社会，文学进入宫廷，作家成为御用时的地位的可悲，以及封建统治者热心文艺的真实用意。

社会是要前进的，它也就要求文学适应它的需要而有所变化。东汉末年社会种种矛盾的激化和斗争，人民的大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儒家一尊的政治地位，也动摇了汉武帝以来写赋以歌颂“上德”的旧的文学传统，乐府诗

（下转第31页）

清朝的绿营

罗尔纲

队制度。

绿营制度，肇自明代镇戍之制，是中国近世五百年来最主要的兵制。但清代绿营建制的目的和作用，与明代镇戍不同，明代镇戍设在九边，目的在于防边，清代绿营，则除东三省（所谓清王朝的“龙兴”之地）由于对以汉人组成的绿营存有戒心而不用外，分布于全国各地，其目的在于厉行其民族统治政策，来镇压汉族和各族人民。绿营建制，划分军区以为镇戍。其建立军区的作用，是为便利作战。在战时，每一个军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有征调全区兵员的权力。军区与行政区域不同，建制的唯一原则是以地形为归，凡有辅车相依的地形则划为一个军区，故两江（江苏、安徽、江西三省），闽浙（福建、浙江两省），湖广（湖北、湖南两省），陕甘（陕西、甘肃），两广（广东、广西两省），云贵（云南、贵州两省），各划为一个军区。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清初本为一军区，设三省总督统之；四川初也与陕、甘合为一区，以川陕总督统之；惟山西地形自成一单位，故以一省为一军区。其后中原平定，直隶、山东、河

绿营和八旗是清朝封建专制国家赖以进行统治的最重要的支柱和对全国进行军事镇压的工具。绿营兵额常在六十万左右，八旗兵额实数约二十万人。绿营兵额既三倍于八旗，而八旗兵到三藩之役之时，又已腐败不可用，因之三藩的平定，专倚绿营，绿营较八旗尤为重要，也就显而易见了。绿营以绿旗为标志，所以叫做绿营。

绿营是清朝入关后就建立的。清朝统治者每逢占领一个地方，就首先接收当地的军队，改建为一种由汉兵组成的绿营的军